
一五一十
周刊
NO. 137
2013年 12月27日
生活在别处
——他们的移民路
月末版“时间与空间”第四期
我在中國
論壇
Co-China

编者的话

2013年，全球移民人数达到2.32亿，创下历史最高，占全球人口的3.2%。无论起点在哪里，奔赴更高的平台生活和发展，是越来越普遍的人生选择。移民，不管是去往大城市还是国境外，都是一次告别旧日时空，重新定位自我的体验。本期周刊月末版以“移民”为线索，继续对"时间与空间"主题的探讨。

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对迁徙感到陌生。战争、政治和饥荒，曾催动无数人行走的步伐。如今，对自由和富裕的向往又催促无数的人自愿离乡，甚至远渡重洋，为自己或者下一代争取更好的平台。宋石男整理的《60年中国人迁徙史》提醒我们：移民不仅仅意味着自愿的追求，也可能是为国家和政治付出的牺牲。

移民离开的理由是什么？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等方方面面的现实，使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打起移居海外的算盘。如许知远所描绘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富裕的阶层，也让他们有能力逃避改革尚未解决的社会弊端。与此同时，中国境内也在接受移民潮的洗礼：农民进城。随着发展的倾斜，"上学，进城，改变命运"成为无数乡村居民的理想。在资本浪潮的推动下，不仅年轻的乡民进入城市，年长者也在子女的支持下离乡养老。张英笔下的梁庄，便是一片萎缩中的村落。

告别了熟悉的环境和关系网，移民不禁扪心自问：我现在是谁？对于那些离开大陆的精英阶层而言，得到了新环境的"身份证"，却不等于融入新环境和得到故有居民的认可。Co-China的"出走"系列论坛认为，"移风易俗"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对新环境的投入：从了解新城市做起，进而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它的发展、保护它的人和历史。

在国内的移民大潮中，有意扎根城市的初来者面临着比身份认同更基本的生存问题。他们从事着基础和危险的工作，甚至还要时刻提防城管的突袭。勤劳从来不能为生活提供任何确定性。当有限的积蓄化为商品房的首付，他们无暇喘歇，转而开始面对更长远的经济压力。王海燕的记录，恰是进城者的生活写照。

在移民身份转换之后，对往日时空该作何解释？熊培云带着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回归故土，却因为眼前的狼藉而发出"故乡沦陷"的感叹。在人口外移造成的凋敝之外，村里的古树也在资本的驱使下被连根拔起，贱卖入城。海外的移民也许经历过同样的感官冲击，但更让他们难以适应的，或许是久别的人情世故。王大骐笔下的父女三人中，留学海外的父亲慑于国内关系的复杂，甘心放弃回归的机会；女儿在海外长大成人，对中国的世故感到陌生甚至惊惧。

在移民的众生相中，三峡移民和海外流亡者是鲜为人注意的群体。为了给三峡水利工程腾挪空间，上百万的居民远走他乡。许伟明在采访中发现，除了"人生地不熟"所造成的困难，三峡移民的不满情绪还招致了"维稳"的注意力。同样无奈出走的流亡者，也在经历寄人篱下的寂寥。他们因为追求政治自由而出走，却也因此失去了回归的机会。陌生的国度自由宽广，却永远不是他们最关心的地方，正如李静睿文中引用的那句话：得到天空的自由，却失去大地的引力。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将本刊分享至：











┣历史┫

宋石男：60 年，中国人迁徙史



自由撰稿人，撰有博客“创造社新任社长”

五十年代：为了国家的需要

華東局關於執行
中央準備五萬三千幹部決議

（华东局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

五万干部南下，接管解放区

1948 年底，当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还做着“划江而治”的美梦时，共产党已经着手为建国做准备了。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发布，数万名北方干部背井离乡、告别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到南方去接管新解放区，执行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剿灭土匪等任务。革命的激情之火燃烧着许许多多年轻的心，在上海和南京，有 1 万多名青年自愿加入刘伯承、邓小平组建的“西南服务团”，每解放一个县，就留下一些人负责政权组织工作，很多上海青年在解放后就留在了大西南，把家安在那里。从那时开始直至解放后，越来越多的中共干部加入到这支迁移队伍中，他们是新中国最早一批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人数不多，但却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权统治基础。





（几位年轻人奔赴“北大荒”。）

工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地区之间的工业、人口等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于是，为了东北工业基地建设、边疆开垦等建设需要，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在上海，1950 到 1956 年间有 20 万名工人被送到华北各地的工业基地；在青海，为了国家的农业垦荒计划，十年间有近百万名青年来到了这里；在黑龙江，有 10 万官兵奔赴“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为了建设新疆，从 1949 年开始，有数百万的居民迁入这块国家西北边陲之地。如今，新疆建设兵团人口已占到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口的七分之一以上。国家进行的三门峡、丹江口等水电站建设，也诞生了大量移民，据统计，解放 30 年来我国共建设了 2000 多座规模不一的水电站，共有 120 多万移民。应该说，他们为新生国家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户口簿

户别	名 称
住户	

（1950 年代的户口簿。）

7700 万农民自由迁徙，成为城里人

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我国并没有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在 1954 年 9 月 20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了居民有迁徙的自由。这时期，农民能自由的进入城市，统计表明，这也是我国户口迁移最频繁的时期，仅在 1954 年到 1956 年的两年之间，就有 7700 万农民成为了城市居民。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为保障城市的粮食供应，1953 年底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国家以低廉的成本收购农民的粮食，再将其统一出售给城市居民。这一制度虽使城市里有了稳定的粮食供应，但造成了大量生活陷入困难的农民进入城市，农村种粮的人变少，积极性也下降了，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增多，城市里的粮食供应变得紧张。在重视城市和重工业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唯一办法便是限制农民入城。于是在 1958 年，我国以法律形式将农民留在了农村，确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文革前后：为了“革命”上山下乡



(50 年代末现“社办工业”中国农民创造乡镇企业。图为毛泽东 1960 年参观技术革新展览会。

数千万农民招工进城，随后又“返乡”

按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的理性，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是从农村到城市，但从 60 年代开始，却出现了一股逆向的迁移潮。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地掀起一股大干快上的风潮。当时，在国家确定的 156 个重点项目之外，各县市也确立了不少工业项目，为了尽快“赶英超美”，各地将招工指标大量下放到了农村，很多农民在此期间变成了工人。仅 1958 年一年



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增到 4532 万人，比 1957 年增加了 2000 多万。1957 年到 1960 年，城镇人口猛增 3124 万，达到 1.3 亿多人。

然而这些项目效益很差，而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加大了城市福利制度的负担。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国家又开始组织部分城镇职工返回农村。据统计，1962 年上半年，全国共下放城镇人口 2600 多万，其中多为前几年招进城市的农民，当时的提法是“增强农业战线的劳动力”。60 年代初期开始的返乡潮，也为之后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放拉开了序幕。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大知识青年浩浩荡荡地向农村开拔。)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早在 50 年代，我国就组织青年学生到农村，1955 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一批中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这被认为是知青运动的开始，但这时的知青下放还不是强制性的，其动因，也和遣返城镇职工大体相似：缓解城市压力，支援农村建设。直到文革后，知青下放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在一些领导人看来，那些闲散在城市里的青年，已经偏离了拟定好的文革路线，因此有必要让他们接受“革命”的再教育。

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毛泽东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第二年，大量赋闲在城市的青年下放农村，中学毕业生也被直接分配到了农村，到 1971 年，有 583 万青年到农村落户，知青下放达到高潮，直到文革结束才停止。在这场席卷中国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中，共有 2000 万名青年被下放，它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直到现在，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





（曾经红极一时的五七干校，如此早已走入了党史博物馆供人参观。）

干部下放改造在城镇职工、青年学生纷纷下放的同时，干部也开始了下放。尽管其绝对数量比不上前三者，但也成为了一个奇特现象。“五七干校”，这一当时主要接受干部家庭下放劳动的地方，成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词语。

1968 年 10 月 4 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介绍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柳河兴办“五・七干校”的经验，文章称：“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随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兴办“五・七干校”之风。仅国务院及中央各部委在河北、宁夏、湖南、江西等四省就建设了 106 所干校，约 10 万名干部在此进行了“改造”。直到 1979 年 2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才陆续停办。

改革开放后：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家乡



（1984 年，邓小平视察深圳蛇口工业区。）



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广东人不再“逃港”

改革前的人口迁徙，多为国家规划的、政治性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自发的迁徙。据深圳市政府所公布的资料显示，在 1962 年，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逃港风波，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 1970 年代末。1977 年，复出后的邓小平视察深圳，后来的报纸这样描述邓小平听了相关汇报后的反应：他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第二年底，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变堵截为疏导，使得逃港潮渐渐平息，其原因也很简单：如果人们拥有了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谁还愿意轻易冒险逃港呢？



(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民工潮”出现，这些“民工”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城市化而到来的的民工潮

1984 年之后，由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生活改善和生产积极性渐渐被释放到顶点，原本在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与此同时，乡镇企业正呈燎原之势，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农民开始进入乡镇企业打工。不过，此时国家政策对于农民的迁徙仍有颇多限制，他们只能是临时工，无法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并被规定只能从事建筑等行业。然而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制造业对廉价劳动力需求的大增，我国从 1993 年开始进一步放宽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据农业部抽样调查估计，1997 年农民工人数为 4461 万人，1998 年为 5481 万人，1999 年 6683 万人，2001 年为 8961 万人，2002 年为 9400 多万人，而目前已达 1.4 亿多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1%。但是，尽管农民获得一定的就业自由，但他们却无法获得城市身份。



（1993 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轰动全国。纽约、出国、奋斗……等一系列词语逐渐汇聚成为三个字——“出国热”。）

出国热：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

比起农民工来，那些更有条件的中国人，选择了出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但在 1978 年，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也仅有 8 人申请自费留学。1984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才算真正打开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大门。此后，出国热一年比一年升温。在 1978 到 1992 年短短的 15 年中，仅出国留学人员就达 16 万人之多。“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是 1993 年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台词，加上 1996 年的《上海人在东京》，热播电视剧再次助推了出国热。如今，中国人出国的动因更加多样化：有为了学习去海外镀金的，有为了移民的，有为了外派海外工作的，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纯粹为了旅游观光。



（2009 年 2 月 8 日，上海举行的一次招聘会上求职者排起了长队。）

年轻人："去大一点的城市"

在某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我们打算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去趟铁岭。"随后观众一阵哄笑。笑声其实折射出一个社会现象：在大城市立足是体面、成功的象征。中国优先发展沿海城市和首都的国家战略，使得大部分的资源都向上海、北京、杭州、广州这些大城市倾斜，作为新兴一代的大学生、城市青年白领，自然将这里视为了创业、生活之地，"北漂"、"南漂"已成为人们的习惯用词。尽管近年来国家有措施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就业、去农村做"村官"，但总体趋势仍然未变。2008 年，教育部"大学生就业首选调查"的结果显示，上海、北京仍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首选之地。大城市，意味着更好的公共服务、更高的工资、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更有品质的娱乐生活。

从历史来看，中国人无疑是很能适应陌生环境的，他们闯关东、漂南洋，凭借勤劳以及异乎寻常的忍耐力，在异乡生存，取得成功。建国 60 年的移民史也是如此，我们很多重要的成就，都是移民创造的，比如早年开垦北大荒，再如近年深圳速度的诞生。孔子曾说："父母在，不远游"。国人之所以远游，无非是相信："希望在别处"。

（本文原为网易专题）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出发┫

许知远：一个移民者的故事


《东方历史评论》主编，作家。

"相当于买了一份保险，安全与自由就有了保障"，他这样形容移民的决定。过去四、五年来，他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这与他的事业有关，随着生意的越来越壮大，他与官僚机构的碰撞不断增多，工商、检察、消防、甚至街道办事处，都随时有权力干涉你。市场改革最初施放的活力，也重新被官僚机构所吞噬。它也因为财富积累得越多，也越恐惧被剥夺，中国商人们面对官僚时尤其脆弱，过去六十年的历史，充满了政府随意掠夺私人财产的例证。"

丝质屏风，悬挂的八角灯笼，白墙上的仕女图，还有热气腾腾的炸酱面，看得出，这家餐馆试图营造老北京的气息。在过去十多年里，这种气氛已日渐消亡，到处是宽阔的马路、玻璃幕墙大楼、闪烁的广告牌，悠长的历史似乎全然消失了，它像是一座新城。

我和他坐在饭桌前聊天。他是这家餐馆的老板。他今年四十岁，毕业于富有盛名的清华大学，和他那一代中很多人一样，天安门事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游行、人潮，坦克与鲜血，让他体验了强烈的激情与幻灭。

当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重新启动经济改革时，他的创造力与能量得到了另一种释放，他成了一名生意人。他从事过进出口贸易，做过电视购物节目，最终因开设连锁茶馆与餐厅而致富。这样的餐厅，他在北京的不同区域还拥有十几家。

他不是那种著名的企业家，却也赢得了足够的金钱，让自己与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他还把多余的精力放在了《易经》与《庄子》上，以寻求精神与智力上的满足。有几年，他沉浸于这种自得——物质富有，还能故作玄妙地引用古老的东方智慧，让周围人侧目相看。某种程度上，他就像过去二十年的时代精神代表，在这个时代，共产党政权与人民达成了合约——不要试图挑战政治权威，给你充分的赚钱与消费的自由。

但今天，他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新人生。他刚从温哥华归来，他明显的消瘦了，皮肤也更黑了，在那边，他无所事事，整天晒太阳，整个人健康、富有活力。他在中心区购买新公寓，考察了几所中学，他的女儿可能在两年后去读书。两年前，他申请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如今常往返于北京与温哥华间。

“相当于买了一份保险，安全与自由就有了保障”，他这样形容移民的决定。过去四、五年来，他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这与他的事业有关，随着生意的越来越壮大，他与官僚机构的碰撞不断增多，工商、检察、消防、甚至街道办事处，都随时有权力干涉你。市场改革最初施放的活力，也重新被官僚机构所吞噬。它也因为财富积累得越多，也越恐惧被剥夺，中国商人们面对官僚时尤其脆弱，过去六十年的历史，充满了政府随意掠夺私人财产的例证。

这种不安全感中，还因为女儿的长大，增添了一种新的成分。在中国亢奋的经济增长数字后，是环境、教育、食品、道德的普遍危机。他害怕自己的女儿无法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呼吸不道德干净的空气，喝不到安全的牛奶，在学校中过早的学会的谎言与虚伪……“移民首先是为了孩子”，他说。

不过，在这过程里，他却发现自己成了最先的受益者。当他独自生活在温哥华时，发现潜藏多年的个人精神开始觉醒了。长期以来，他为了不知疲倦的工作，忙于应付中国过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也沉浸于狭隘的成功感中。而在这个陌生国家，他重获个体自由，他要去周游世界，学习潜水，或许有一天，还能熟练的用英文交谈与阅读，这是一个新的自我。听起来，这像是一个有趣的悖论，他一方面要他要摆脱中国的不确定性——它与政治与社会制度相关，同时，他要摆脱一种牢牢的确定性——它是价值观与心理范畴的。

他去温哥华做什么？再开一家北京面馆吗？他还没想好，但他觉得自己比过去更自信了。



他是中国新移民浪潮中的一员。19 世纪以来，战乱、革命、饥荒，还有寻求财富，都把中国人吸引到海外。但与之前的历次的移民浪潮不同，这也一次移民者们既不是广东、福建的村民，也不是留学生，而是中国社会知识精英与新富阶层，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中上产阶级。他们离去的中国不仅不再孱弱、深受屈辱，反而处于一个空前富强的时刻，被认定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而他们既是其缔造者，也是受益者。

他们的离去，也正表明中国崛起的另一面。在整个国家日益强大的同时，个体仍倍感脆弱。它能发射宇宙飞船、创造经济奇迹，却不能许诺个人基本的安全。他们用脚对政治制度投了不信任票，连他们这群成功者，都不再有能力来改变政治与社会制度，唯一能做是逃离，保存最后个人的安全与自由。

但或许，这也是这个古老国家完成自我更新的重要步骤。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像我的朋友一样，重新发现世界与自我，他们则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思想与动力。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张英：梁庄不再是他们的家



南方周末记者。

“

梁庄曾有 150 户人家，六百四十多口人，如今的留守者不到 200 人，大多是老人和儿童。30 年里，村民陆续离乡，前往北京、郑州、西安、深圳、青岛、内蒙古、新疆等地打工谋生。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 360 万个，锐减到只剩 270 万个。每一天，中国都有上百个村庄消失。

”

梁庄在河南穰县，离省会郑州 426 公里，离南阳 80 公里。在中国地图、河南地图上，都看不见它。即使在南阳市、郑州市的地图上，梁庄也只是一个小黑点。

因为学者梁鸿的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出版，这个普通的村庄，逐渐被外人知晓，和费孝通笔下“江村”一样，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标本。

《中国在梁庄》出版单行本前，已获得当年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通过五个月的回乡调查采访，梁鸿还原了梁庄近 40 年来的变迁故事，真实记录了乡村的破败和荒芜过程。此后，梁鸿又花了一年时间，沿着梁庄人外出打工的路线，走访了十余个省市三百四十余人，在《人民文学》发表《梁庄在中国》，讲述三代农民工在城市谋生的故事。出版单行本时，它改名为《出梁庄记》。2013 年 4 月 28 日，梁鸿凭借《梁庄在中国》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

梁庄曾有 150 户人家，六百四十多口人，如今的留守者不到 200 人，大多是老人和儿童。30 年里，村民陆续离乡，前往北京、郑州、西安、深圳、青岛、内蒙古、新疆等地打工谋生。

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 360 万个，锐减到只剩 270 万个。每一天，中国都有上百个村庄消失。

梁庄也是那千万个即将消失的村庄之一。2012 年劳动节，南方周末记者从邓州出发，在梁鸿及其家人陪伴下来到梁庄。

“六○年都是贼”

“她爷和三爷都是饿死的。”梁鸿的父亲梁光正指着自家老宅后院里的两个土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梁庄所在的穰县出产小麦、棉花、烟草、辣椒、花生、芝麻，村里住着梁、韩、王、钱、周、张、袁、刘等姓氏，梁姓和韩姓人口最多。在两百多年的历史里，梁、韩家族，轮番做村庄的统治者。

灰瓦泥墙的房子是解放初期的，大多数快塌了；黑瓦灰砖的房子是 1960、1970 年代的；红砖红瓦的房子建于 1980 年代。一些高墙围住的两层楼房，是最近 20 年里盖的。

梁鸿家的老屋有 3 间，黑瓦灰砖。院墙已经坍塌，厨房被邻居改造成了厕所，房屋的一角也塌了，露出黑亮的大梁。邻居还开垦了前院，种上蚕豆、花菜、大葱。

梁鸿的爷爷是 1960 年 2 月 14 日死的。政府搞集中养老，爷爷提着夜壶，背着被子，去了四天，结果饿死了，躺在薄席上抬了回来。梁光正在南阳修水库。“六〇年都是贼，谁不偷饿死谁。”当时梁庄连一棵树都没有，树都砍掉“大炼钢铁”烧了，树叶都没得吃。

1960 年，梁家二百多口人，每天人均口粮从四两变成二两半。结果这年饿死了七十人，家家户户都有人死。“大炼钢铁”留下的一个大坑里，堆满了饿死的人。

“当时粮食都在各大队粮仓里，放坏了也不让吃。梁光明是村里保管员，他家饿死人最多，爹妈、嫂子都饿死了。他二嫂半夜去偷麦子，被人打断了腿，他也不管，最后饿死了，侄女没人管，也饿死了。”梁光正回忆说。

那年夏天，麦收之后，梁庄人终于可以吃上粮了。“结果又死了一批老年人，因为饿的时间长了，肠子饿细了，一吃多，就撑死了。”

1962 年，梁家还是吃不饱饭，梁光正弄些碎烟叶，挑着担子到山区换粮食。没想到换的粮食在隔壁县让“四清”办公室没收了，“我哭一路，两手空空回了梁庄”。



“上学，逃离农村，改变命运”

1978 年改革，土地责任承包制并没有给梁庄带来好运。梁庄“人多地少”，1960 年代人均一亩半地，到这时候只有人均八分。“靠种地只能吃上饭，手里没有闲钱，孩子上学、生活开支经常得跟别人借。”梁光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梁鸿是家里第五个孩子。母亲生了八个，第一个男孩夭折了，梁鸿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妹妹。梁光正要养活七个孩子，生活压力特别大。“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连糊口都不够，家家贫困不说，一到春天就断粮。”梁光正说。为减轻经济压力，父母把梁鸿的大妹妹，送给了附近一家人。

“每到春天，就青黄不接，春天麦子还没上来，冬天的粮食也快吃完了，家家都处于半饥饿状态。”梁鸿记得，小时候家里只吃两顿饭。“春天阳光比较暖和，我们站在墙边晒太阳，可以不运动，少吃饭。”

所有的家长都会告诉孩子，只有好好上学，才能变成城里人，转户口，有工作，能吃饱饭。

梁鸿至今很感激父亲。“我们家除了三姐在家照顾母亲外，其他孩子都上学。那时候我父亲满村借钱。因为我们老拖欠学杂费，一开学经常被罚站在门外边。我小妹妹也是中专毕业。我们这样的贫困家庭，3 个孩子靠上学，逃离农村，变成城里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大姐第一个离家，考上了南阳医专。“大姐 9 月份上学，我妈 10 月份病倒了。一个月十块钱的津贴，她节省下来五六块，贴补家用。”毕业后，大姐分配在邓州医院工作，转了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成为家里的榜样。

大姐经常给梁鸿写信。“有一次她写了带着着重号的一行字：‘只有上学才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在农村，过不了好生活，吃不饱饭，农村是愚昧、落后，只有逃离农村，才可能有好生活。”

梁鸿初中毕业，15 岁时考上了当时的邓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邓州下面一所乡镇小学教书，一个月有 60 块钱工资，“可以缓解家里的困难，供妹妹上学了”。

梁鸿刚工作不久，就有人来提亲。“对方是城里人，家里有房子。我姐姐、姐夫当时都劝我同意，但我不甘心，我觉得生命不应该停在这个地方。”



工作三年后，梁鸿报考了南阳教育学院，脱产读大专。大专读完，她又通过了本科自考，考上郑州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接下来又读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博士。2003 年，梁鸿留在北京，成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

“最早出去的，又最早回来”

2010 年 10 月 11 日，梁庄的最早外出打工者梁贤生，因晚期癌症在南阳去世。他的骨灰回到梁庄，葬在梁姓的墓地。“最早出去的，又最早回来了。”

梁贤生家在梁鸿家左边，两家只有一道象征性的矮墙隔开，彼此都很熟悉。1982 年，梁贤生离开梁庄，到南阳打工。那时候梁鸿不到十岁。

在梁庄，梁贤生是个传奇人物。最早娶城里媳妇，最早开着小汽车回梁庄，激发了更多的梁庄人外出打工。

“改革开放的惟一好处是，农民可以到城里打工，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啥活，总能让家里人吃饱饭，维持日常生活运转。”

梁庄人的打工地图，从邓州开始，后来是南阳、郑州，北京、西安、青岛，最后扩散到深圳、东莞、中山、厦门，天津、内蒙古、福建、新疆。

出门打工的四百多梁庄人，分布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踩三轮车拉货、开店铺卖杂货、在集贸市场摆摊卖菜、干建筑工砌墙刷漆、干裁缝开服装店、在家当算命先生、当厨师开饭馆，或者在工厂打工。梁鸿的二姐、三姐、哥哥，也都是这股打工洪流中的一员。

二姐高中毕业，经在新疆工作的伯父介绍，去新疆一所中学当民办教师，教英语。工作三年，她始终适应不了新疆冬季的寒冷，身体也一直不好。二姐后来回到梁庄嫁人，如今在县城干废品收购。

三姐长期在家照顾生病的母亲，没有上学。母亲去世后，她曾去广州打工，在一家食堂打杂，洗菜、洗碗；因患有类风湿病，一年后回梁庄嫁人，现在在县城开了家电器商店。

哥哥高中毕业后，先是在城里表哥的建筑队里干泥瓦匠，一天五块钱。泥瓦匠是体力活，饭量大，攒不住钱。他改行学木匠，到陕西延安，给农村人包沙发做椅子。后来上北京打工，在北京站倒火车票，赚个手续费，被警察抓住送到昌平，关了两天两夜，遣送回安阳收容站。收容站把他们卖到砖瓦厂，一人一百块钱。



“砖厂那片天都是灰色的，有几个人拿着棍子，盯着干活的人，谁走得慢了，上去就打。住的地方是几个石棉瓦棚，不累死也会冻死。第二天一早，铁门一开我就拼命地跑，鞋都跑烂了，看守的人没追上。”哥哥说。

回到梁庄，哥哥进了卫校学医，后来结婚成家，在吴镇开了个小诊所和一个旅社。

小妹和大姐在医院上班，在邓州安了家；父亲也在邓州居住，养老。对梁鸿一家人而言，梁庄不再是他们的家。

注定消失的村庄

今天的梁庄，让梁鸿越来越陌生。除了荒败的老屋、几亩青绿的麦田、母亲的坟地，她熟悉的事物，已经不多了。这些年，在春节、清明这样的节日，梁鸿一家人才会回到梁庄，去河边的坟地，看望长眠地下的母亲。

梁鸿走了 20 年的道路已经废弃。村旁的土地庙不见了，幼时开满荷花的清澈水塘已被填埋，如今坐落着一排新盖的楼房。村北的树林和河滩，过去是全村人消暑的宝地，盛夏傍晚他们在这里洗衣、洗澡、聊天，直至夜深，如今河滩已经开垦成良田。湍河不再宽阔，只是以前的 1/10，甚至季节性断流，河床满是挖沙后的大坑。

因为缺乏管理和统一规划，整个村庄看上去杂乱无序。房屋的朝向原本整齐统一，现在各自为政，四处开花；有钱、有能力的人沿公路而居，没有能力的穷人住在原来旧房里。乱搭乱建让人分不清方向。

即使是中午吃饭时刻，村里也很少看见人。村庄静得可怕，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偶尔遇到有人在家，但梁鸿已经不认识他们了。

因为土地流转，承包到户的土地又重新被整合。资本正在进入梁庄，集中起来的土地，实际上受控于有金钱能力和销售渠道的人。有个老板种烟叶，租了梁庄几百亩地。他要雇劳工，五十多岁的梁庄人给他打零工，一天挣 30 块钱。“分田到户几十年后，梁庄人开始在属于自己的责任田里给别人打工。”梁鸿在《出梁庄记》中写道。

如今回到梁庄定居的，基本上是第一批外出打工者。有时候突然回来，盖一栋楼房，娶媳或嫁女，在家过一个春节，然后继续在外打工。这样的中年打工者，不久就会回到村庄，因为他们就要开始准备照顾孙子或孙女。再就是丧失劳动能力，身体不好回乡养病的。



第二代打工者即便选择回乡，也没有回村。他们不爱种地，对农村也没有感情，大部分选择在南阳、邓州的小区买楼房，或者再投资一两个商铺，准备做点小生意，养活一家人。梁贤生兄弟姐妹定居南阳。韩家恒在内蒙古和南阳都买了楼房；弟弟韩家武也在南阳买了楼；姐姐韩朝侠则定居在内蒙古，一家人的户口都迁了去。他们不再回乡，也不再和梁庄有牵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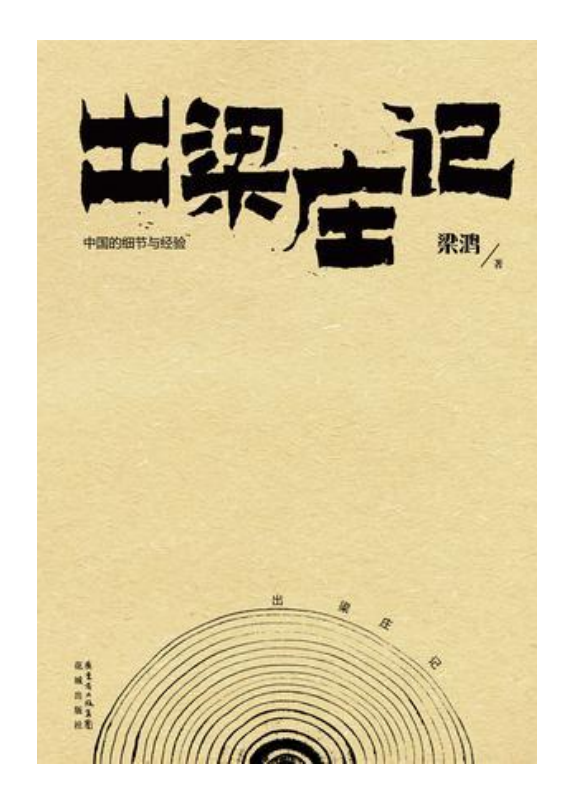
第三代打工者，今天更加年轻的 90 后，在城市夹缝里长大。对他们来说，梁庄是一个陌生、遥远的地方。“长期在城市生活，他们日常消费、生活习惯已经和城市人无异。他们更不会选择回乡。”

在《出梁庄记》的后记里，梁鸿写了一个她听说的消息：“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加大，梁庄未来可能消失，并村还地，和邻近两个村合并，村民搬到楼上，村庄划为良田。”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梁鸿：《出梁庄记》



2010 年《中国在梁庄》出版，它是梁庄人留守在梁庄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进城农民，在这部《出梁庄记》当中得到书写。《出梁庄记》主要人物有 51 位，51 位中，外出务工时间长达 20 年以上的有 26 个，外出务工时间 10 年以上的有 15 个，平均外出打工时间为 16.7 年。然而，他们进入了中国的哪些城市？做什么样的工作？如何流转？他们与城市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是否想回去？怎样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样思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历史形象，他们的身份，是如何被规定，被约束，并最终被塑造出来的？中国有近 2.5 亿农民和梁庄打工者一样，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曾熟悉。然而，他们构成完整的农村与城市，构成完整的中国。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影】阿斯哈·法哈蒂：《一次别离》



纳德与西敏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女儿叫特梅。西敏希望一家三口移居国外，但是纳德坚决反对，原因是纳德的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需要照顾。两人为此对薄公堂，准备离婚，但是法院驳回了她的请求。西敏赌气回了娘家。西敏走后，纳德分身乏术，聘请了一位护工瑞茨照顾父亲。但是，父亲如厕问题始终困扰瑞茨，依《古兰经》教义，她感到禁忌重重。瑞茨的女儿陪伴在她左右，也令她分神。几个回合下来，纳德某次回家发现，父亲被绑在床上，出离愤怒的他推倒了瑞茨。没想到怀孕的瑞茨竟然流产，瑞茨丈夫怒不可遏将纳德告上了法庭，他们各执一词，然而真相却出人意料……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住下┫

Co-China："出走"系列论坛

"

新移民必然会面对重新确认身份的问题。当你没有移民的时候，一般我们不大会问"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一定是在冲击之下，身份问题才会凸显。而一个人原来的资本，会影响到他如何去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原有的资本中最直接的当然是金钱资本；然后是文化资本；另外就是你的社会网络资本。

"

梁以文：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移民来香港了，可直到二十几年之后，03 年的七一游行，我才感到自己是香港人。那天我在去维园的路上看到周围的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游行当然也是，游行之后晚上我在九龙吃饭，餐厅里还是有很多穿黑衣服的人，大家谈论的也多是刚才的游行。再晚一点，我到新界宵夜，周围还是不少穿黑衣的人。那一天印象特别深刻，我突然觉得我跟周围的人产生了一种关系。

为什么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像一个旁观者、一个局外人，这一切直到 03 年七一才发生变化？我想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新移民必然会面对重新确认身份的问题。当你没有移民的时候，一般我们不大会问"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一定是在冲击之下，身份问题才会凸显。而一个人原来的资本，会影响到他如何去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原有的资本中最直接的当然是金钱资本；然后是文化资本；另外就是你的社会网络资本。对于有一定资本的人，比如经济条件还不错的



人，当他来到香港后可能发现周围的人没他有钱，那他就会认为香港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的条件比你好，我为什么要融入你这个地方？文化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本也是一样，虽然很难量化，但还是会让有些人享有一种优越感。反而是对于那些什么资本都没有的人，他会更主动想去融入。因为他真的会觉得我比较差，香港人比较好，他会主动想要变成香港人。

另外一个不能适应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从一个现成的人际网络中掉了出来。我祖父母辈，他们有他们的单位，有他们的同事，父母辈也一样，他们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网络。作为孩子，也是在这个网络中成长的。比如我们小时候，小孩子会到处跑，去邻居家，去父母的同事家，绝对不会把家门关起来自己在家里。但到香港之后马上就从原先的人际网络中掉落出来，一切变得非常个人化。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使我当时比较难以融入这个城市，只是缩在自己的小蜗居中，外面发生什么事也都不知道。

其实新移民本来应该是一个技术性的词，来了 7 年之后，拿到了身份证，就不再是新移民了。但是在文化层面，“新移民”多跟贫穷等负面意义相关，公众有一个文化共识。

八十年代，大陆同香港之间的差距比现在大得多。那时香港社会是很歧视大陆人的，那种不平等不一定体现在日常相处——可能你周围人对你都很好——而是整个社会的气氛。但我自己的看法是：八十年代我们被看不起，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恶意，顶多就是电视电影中的笑点，比如讲大陆妹、大陆仔如何如何。但是现在，特别是 97 年金融风暴那段时期，争夺资源的压力出现之后，其实整个香港社会对新移民是更加严苛的。

我印象很深的是 2000 年的一条新闻。当时有一些争取居港权的小朋友在街上派发传单，希望取得社会人士的支持。有一个中年女人指着那些小朋友就骂：你们回大陆去，不要到香港来抢东西！

除了公众的歧视，香港政府从政策上的歧视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看今天的移民政策，很多人都感觉似乎回归之后大陆人移民香港越来越容易了，有优才计划、专才计划，有投资移民等等，但这针对的只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上层人士，那些底层的人想要移民还是非常困难的。

香港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一些男子六、七十年代从大陆偷渡过来，因为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他们在香港一直找不到老婆，后来年纪大了就返大陆乡下去娶，然后生个小孩子。按香港政府的规定若以家庭团聚为理由申请移民需要等很长的时间，夫妇团聚一般要等四、



五年，甚至更长。这样的情况下，妈妈就只能用双程证，3 个月来一次，然后再回去申请。这些妇女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一方面她的婆婆会看不起她，说她是大陆婆，另一方面丈夫也常常看不起自己的老婆，觉得这是他实在没有选择之后的选择。这样的家庭也常有家庭暴力发生。

而在这种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面临很多困境。我做研究的时候，去香港两个比较贫穷的地区——天水围和深水埗做访问。学校里的老师就跟我讲，你放学的时候去门口看，那些长得像爷爷的其实都是爸爸，这就是这种家庭结构产生的问题。老师还说，他们要尽可能多搞一些活动，比如带孩子们去九龙看看，去香港看看，因为他们的家庭是不可能带他们过海的。这些小朋友到了香港之后最多的时间都是缩在公屋或者板间房里，他们并不知道香港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生活的那间小小的房子就是他们认识的香港。学校的老师去做家访的时候发现这些孩子的周末活动基本上就是和父母看一天的电视，不会出去购物，不会去公园，不会参加各种活动，他们的生活就是如此。

公众的歧视，移民政策对新移民群体都是非常不公平的。我理解香港需要优质的人口，但这一切是否可以建立在一种稍稍公平的制度之上？这该是我们反思的。

闾丘露薇：我真正感觉到我属于香港这个地方，可以很自然地说我是香港人，是在我来到香港十几年之后。我感受最深的是反高铁的时候，我站在立法会外面，看见那些年轻的“八十后”表达他们的诉求，我会感同身受，我发现自己是那么关心它。我想大概只有你对一个城市有了足够的认同感，把这个城市真正当成自己的家，这时你才会关心它可能的点点变化，政策制度的调整等等。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种心理的转化。

我的女儿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我和这个城市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我为什么还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融入香港？我想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自己工作的关系，我一年中有很长的时间不在香港，而且我在工作中涉及最多的是国际新闻，不太关注香港本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另外，我觉得我自己缺乏一种公民意识，这也是我这两年一直在反省的。之前一直觉得我只要关注中国就够了，从情感上来说我确实也对它有更大的兴趣，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若你对自己生活的地方都不关心，反而去关心那些宏大的、距离遥远的东西，我总觉得出发点有一些可疑。如果我们真的要体现自己的公民参与感，就要从和自己最直接相关的事件和人开始，那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当然是无从回避的。

从内地来港的人士可以大致分为下面的几类：第一类是家庭团聚的，每天有 150 个名额。10 年下来差不多 50 万人，在总共 700 多万的香港人口中占的比例绝对不算小了。第二类



是所谓的「专才」，在国外工作过几年的大陆人持中国护照就可以进入香港工作。第三类就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来港读书的学生。还有一类是中资公司的雇员，他们比较特殊，在香港住满 7 年也不会成为永久居民，但他们的人数也不算少。这几类人在融入香港社会时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刚才以文谈了第一类，那我主要讲后面几类。

我在 96 年的时候采访过香港第一个海外归来的专业人士团体的几个创始会员，跟他们谈论如何看待香港回归。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现象：他们的朋友圈、生活圈基本和香港没有任何交集。即使到现在，你跟他们聊起他们的香港同事，他们还是会说「他们香港人」如何，虽然他们自己其实已经在香港生活了十数年。但在他们的意识中香港依然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地方，这个城市到底怎样对他们不重要，只是他们的工作在这里，他们的钱是在这里赚的。

另外还有一个群体就是香港的各个大学中越来越多的有内地背景的老师。我们会发现当香港有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是极少发声的。他们也甚少和学生讨论香港本地的议题，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香港今天发生了什么。我就遇到过一些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的大学老师，他们从未看过本地电视台的新闻。我觉得这样的状态蛮奇怪的，其实他们能有现在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香港这个社会给他们的，但他们从未有要回报这个社会的想法。

大陆来这里读书的学生和这个城市的融合要稍微好一些，可能是因为年纪比较小，他们更容易学会和周边环境相处。但即便如此，我在浸会教书的一些大陆来的学生，还有公司的一些年轻同事，在这里工作了几年之后都决定放弃香港，回到大陆。一方面是他们觉得香港生活成本高、压力大，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上的孤独。他们常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很难去结识新的朋友。

在融入香港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否认大陆人自己的心态不够开放，但是香港社会自身是不是也有问题？我觉得香港是一个蛮排外的社会。我的一个朋友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之后，他想去参与竞选区议员，但他发现非常困难。因为他的广东话讲得不太标准，那他的口音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他的形象，决定了选民是不是会投他的票。再举一个例子，香港环境局副局长潘洁，虽然她已经是政府高官了，但直到今天她的口音依然是公众和媒体嘲讽的对象。

当然，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移民和城市的融合问题，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带来的冲撞，彼此之间的无法信任和不能理解，这些都导致了移民和所在城市的隔阂，华人社群似



乎更为普遍。这和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我们从来不鼓励大家参与公共事务，因为不参与，你和你所在的城市就无法建立起联系，自然也难有认同感。

建立对一个地方的归宿感的确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但在这过程中社会参与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我建议大家从关注这个城市每天发生了什么开始，从看本地新闻开始，慢慢的，或许你无需用和我们一样长的时间就会发现，你可以很自然地说“我们香港”，你会觉得在这里发生的一切真的是和你有关，这就是你的城市。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王海燕：奋斗和结局——关于我父母的打工路


探索中的青年记者

“

回顾我的爸爸妈妈的打拼历程，勤劳节俭是用不着预设的基本前提。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算有头脑的，在我们家乡已算比较成功；他们还很幸运，我们家从来没有遇上任何天灾人祸，甚至交了好运；他们还很善良，从未做过坑蒙拐骗良心不安的事。至于代价，他们上无力在家侍奉老人，下不能和儿女团聚，长年漂泊让他们觉得任何地方都不是家，他们的一辈子从未获得安顿。即便如此，我的爸爸妈妈，以及千千万万和他们履历相似的人，却一直战战兢兢活在害怕和焦虑中。

”

我的妈妈很聪明，有灵活的生意头脑，她很勤劳；我的爸爸，他简直是个能工巧匠，他非常勤劳。他们有着一个最基本的美好心愿，那就是衣食无忧，家庭幸福，他们一直为此奋斗努不已，但在中国，在当代中国，他们却一直活得战战兢兢。

我爸爸在 90 年代初期就到上海打工，是四川最早一批外出谋生的农民。他当时在拆迁工地当工人，施工队里出事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小则伤筋动骨，大则命送异地。我妈妈 1997 年也去了上海，最初在施工队里做饭，然后在工厂做工，最后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的她敏锐而大胆滴做起了卖烤肉串这个小生意。



我妈现在对肉串生意记忆最深刻的是“冲摊”，冲摊，就是一溜小摊正在热火朝天做生意，远远有城管过来手提棍棒走过来，像见到猛兽，所有小贩丢下自己的家当财产，撒丫子逃命。等缓过来，最值钱的推车什么的已经不见了，地上一片狼藉，大家找找还能收拾的东西，各回各家。

随后，开小面馆，开面包店，在这些低利润、高房租和手续繁琐的行业底层，我百炼成钢的爸爸妈妈一直在和有关方面斗智斗勇，不屈不挠。

生活一直处在一种动荡的危险里，他们一直活在一种害怕和焦虑的不安中，最开始他们以为这是手里没有任何资本的缘故。

03 年，有了一点储蓄，爸爸妈妈转行做旧建筑材料，就是在拆迁工地上回收各种木头材料、门窗、瓦片这些，再整理卖出。这个活非常累，经常是在一堆建筑垃圾，水泥、土、砖头、废物，里面刨出有用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捡垃圾。但累其实不值一提，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

整理堆放材料需要场地，而规范合法而且便利的堆放场地，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基本不可能，说到底，他们做的只是小生意。所以一般是在郊区找要开发又还不急于建设的地方，找到相关负责人，活动活动，租下一亩左右的场地，没有任何保障地安营扎寨。

这样的地方通常挨近臭水沟或垃圾场，没有任何生活设施，房子是用旧木板搭的一两间棚子，水电自己想办法，总之就是自生自灭。即便这样，稳定依然是没有的，场地提前开工了，负责人调换了，上面的检查严格了，或者只是因为那个附近的居民不爽了，你便应该知趣识相地赶紧滚蛋。

我爸爸妈妈他们 8 年里平均搬家频率是一年一次。以至后来我爸爸妈妈完全可以半天盖好一座“房子”，一天解决所有搬家带来的混乱，效率之高，质量之好，他们才真正明白时间就是金钱的真谛。

然后就是买主，这些材料的买主有小包工头，也不乏大工程负责人，这些材料完全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至少质量不会比那些“高效率”生产出来的新材料差，或者差一点大概也无所谓，重要的是价钱要便宜一半甚至更多。但永远不会出现固定的销售渠道，永远是摸着水过河，有的时候新搬到一个地方无人知晓，木头材料白白烂掉都是可能的。

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妈一直用“天要生你就会养你”这句很土也很有哲学味的话安慰我爸爸，他比较悲观，一有动荡便会唉声叹气。



而我妈是比较乐观的，一直说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在混乱的大官大商拼挤敛财的缝隙里，至少他们削减了脑袋还能在人群里捡到一些利益的残渣。

但我妈的乐观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说了，我妈最开始以为她的不安全只是来自于赤裸裸的一穷二白，但后来她发现不是这样的。

07 年，我们家有了一点存款，当时正是中国楼市叱咤风云的时代，我们老家不少人倾其所有都在县城买了房子。我妈经过仔细权衡，决定把钱留给我和我弟弟读书，她已经很前卫地把子女教育看做一项投资了。她曾亲眼目睹我伯父，一个本分尽职的乡卫生院院长为了供两个儿女读书，如何节衣缩食，砸锅卖铁。我伯父至少还是公家的人，而她只是个农民，所以她怕，非常怕。说什么，她也要把钱存着，她觉得那是保障。

但到 2011 年，我的爸爸妈妈发现他们的想法跟不上形势了。虽然她手里的钱略有增多，但和人民币自由落体般的贬值速度比起来，那点增加简直微不足道，也就是说，钱根本是放不得的。她想把它变成稍微有保障一点的东西，黄金这种硬通货不用考虑，那需要真正有闲得发霉那么多的钱。

她再次郑重地考虑房子，不过几年前的房子在这个时候已经孙悟空一样，在价格上翻了 n 个筋斗云。好在赶上新农村建设，我们家的土地几乎全被规划在建设用地上，于是一下子凭空掉下了许多钱。

我妈正式决定在城里买一套房，那套房子现在还没完工，但大部分存款掉进了首付，而漫长的还贷之路还在等待着我们全家人。其实促使我妈下定决心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她发现，在我们老家，在城里若没有一套房子，娶媳妇比登天还难，姑娘们也许比她还没有安全感。虽然我弟弟还没到那个年龄，但我妈觉得这样的未雨绸缪实在很有必要。

买房子是为了让那点不足为道的存款不至变成一堆废纸，但买房过后，我妈妈的不安全感更深了。

农村的土地本来是他们的退路，虽然务农的高成本低回报本就是一条死胡同一样的路，现在这条路被彻彻底底切断。城市里的生意是他们现在的立身之本，但现实是做了八年的生意早就开始愁云惨淡，建设废地越来越少，买主更是越来越少。随着社会第一次转型期的完成，社会的利益分配越来越严丝合缝，已经遗落不下多少残渣给底层小人物。城市这个上帝曾经对他们打开的窗正在一扇一扇关上，而门从来就没有打开过。至于出路，那一直被押在我和弟弟身上，我们都很努力，念了不错的大学，我妈一直对这项投资的回报信心满满，但不幸的是，她一直热烈而执着地关注新闻，她唯一幸存的一点信心也开始动摇。



回顾我的爸爸妈妈的打拼历程，勤劳节俭是用不着预设的基本前提。起早贪黑，我们全家每个人脚上都布满废铁定刺穿的疤痕，三四十个小时的火车从来都是硬座往返根本不值一提。值得一起的是，他们还算有头脑的，在我们家乡已算比较成功；他们还很幸运，我们家从来没有遇上任何天灾人祸，甚至交了好运，偶然地有了一块很值钱的田，而这田是为了让更多的农村人住上新农村的高价房；他们还很善良，从未做过坑蒙拐骗良心不安的事。至于代价，他们上无力在家侍奉老人，下不能和儿女团聚，长年漂泊让他们觉得任何地方都不是家，他们的一辈子从未获得安顿。

即便如此，我的爸爸妈妈，以及千千万万和他们履历相似的人，却一直战战兢兢活在害怕和焦虑中。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哈金：《自由生活》



武男一家身处在没有亲友人际网络的陌生社会，重新学习独立，尽力维持生计。“你必须去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当然，美国不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但确实是一个拥有最多自由的国家。而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武男这个热爱写诗的人不得不成为餐馆的大厨，用武男话来说，“当服役的马，拉全家的车”。即便如此，他始终不肯放弃成为诗人的梦想，后来总算以诗歌从困境中突围。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影】《内人/外人》新移民系列电影



四个女人，分别从不同的国家， 嫁到台湾不同的地区，成为新移民。 相异的个性，相异的际运，或温馨或悲情或荒谬…这是她们，也是我们的故事。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回归┫

熊培云：我的故乡因何沦陷


自由撰稿人。

“

我曾经因为自己生长在农村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可以还乡。然而眼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乡居期前，我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虽读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

我曾经为“出国，还是下乡？”苦恼不已。几年来，我一直想完成一项因留学而中断的田野调查。2008 年夏天，趁着北京奥运的这个长假，我独自回到了江西清僻的故乡。临行前，凑巧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上读到 1932 年农学家董时进发表的一篇《乡居杂记》。文章开篇正好道明了我的心曲：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地认识乡下。”



乡居期间，确有不少收获。比如，更了解了父辈、祖辈们生活中的辛酸与荒诞。仅就情节而言，如果有人愿意且有能力将其写成小说，想必也不会输于余华的《活着》。和许多朋友的故乡一样，在那里，“活着”是一种最真实的信仰。农村是中国的土壤，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这种世代相袭的“活着”的信仰，为这些穷乡僻壤造就了某种生生不息的气象。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乡村正在开始的一种新生活。如卫星电视、彩电、冰箱、空调渐渐进入一些农民的家里。坦率说，这一切变化都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双抢”，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时所无法想象的。当然，有些变化也让我五味杂陈，在这个从行政上来说最偏僻的村庄里，有些人家虽贫穷却还用上了饮水机。农民不仅抛荒了大量田地，而且不再种菜，开始学着城里人一样买菜吃。这些变化似乎在告诉我有一种美好的东西正在乡村流逝。

至于耕牛，基本绝迹，代之以小型农机具。由于养猪不合算，村子里也没有了家猪。记得前些年，村中几乎无狗，如今满村狗跑。它让我想起城里小区看家护院的狼狗。显然，乡下狗之所以多起来，同样是为了看家护院、维护治安，因为许多身强力壮的人都到外省或者附近的镇上去打工或做散工了。而且，有证据表明，附近的偷鸡贼并没有到大城市里去干大事业，而是继续留守乡里，以此“小本（事）经营”。

当然，“偷鸡贼”对村庄或者农民财富的毁坏，还不足以令人切齿。在我乡居期间，听人谈得最多的是村中几棵古树的毁灭。这些树通常都生长了一两百年。大概是在两三年前，一些古树贩子在本地线人的带领下将这些树连根盘走。据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朋友说，这种古树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然而，村长自作主张时却可以不顾村民的反对，以一棵 700 元的价格贱卖。当然，村民的反对也并不齐心，许多人“怕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长不顾村民意见与权利，得罪诸位在先。

据说，树贩子当时看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乡民干活时歇息乘凉的树，一是村中祠堂后的树，另一处是祖坟边上的树。最后，尽管遭遇抵抗，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村民们以此反对卖树时，某夫人竟痛斥村民“现在每家都有电扇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所幸，祖坟边上的古树被留了下来。之所以没被卖掉，是因为有壮士以祖宗之名拼命，树贩子与村干部方才罢手。如此看来，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的文化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私有的、孤零零的祖坟，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赚得了一点尊严。的确，许多农民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将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



我曾经因为自己生长在农村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可以还乡。然而眼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乡居期前，我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虽读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近些年来，网络上下，有不少朋友写下了“故乡沦陷”的文字。这个夏天，我亦清晰地回顾了自己的故乡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下如何沦陷，尽管这个村庄原来也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它现在也在生长希望。为此伤感时，我更能体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掌权者，手中那不受约束的权力!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王大骐：一个家庭的移民史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

中国有比美国长数千年的历史，美国只是一个新生儿。中国的人口远比美国多，同时中国政府的法律和法规也很不同。文化和人民也不一样。你不能把这些变数都囊括进来然后还能看出谁更好。尽管如此，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虽然价值观不同，但我们都渴求一样东西：幸福。

”

80 年代末，老史作为优秀科技人才，被公派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省读博士，他的四川同学则大多数被分配到了绵阳，至今依然在那里做研究。

那个时候出国热刚刚兴起，留洋的人总被认为是一个家庭的骄傲和街坊邻居的谈资，尤其是那些从国外寄回来的工资或奖学金，它们轻易就能让在中国的亲人们成为“万元户”。

5 年的苦读换回了物理学博士学位，这时正好有机会，老史又用两年去荷兰读博士后，接着他已无书可读，面临的是找工作的烦恼。拥有博士后身份在某些时候是一种劣势，首先你很难申请到其他国家的签证，例如老史最想去的美国，它们认为你一旦入境肯定会非法滞留下来。而找工作也是极其困难，因为大部分工作都会嫌你资历过高。

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工作申请也得到了回复，其中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都希望洋博士回去当教授，而深圳的一个环卫局则直接提出聘任他为局长、配房配车的条件。为此老史在多年后再次回到中国，走访了一圈，他发现，留洋多年的自己早已无法适应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最终他放弃了回国的机会。

托熟人介绍，老史在巴西找到了在大学任教的机会，同时申请加拿大的移民，移民的批准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今年 1 月，老史全家宣誓成为美国公民，定居在西雅图，住在带着大花园的别墅里。目前老史在微软的市场部工作，面对强劲的竞争对手 Google，老史从早上 8 点工作到晚上 10 点，他的“小格子”四周没有窗户，有窗户的位置是给企业里有一定等级的人配备的，中午吃的是前一晚的汤泡饭，但他还是觉得在美国努力和回报总是成正比，这点让人欣慰。

老史的大女儿目前在亚利桑那州充当当地大法官的助手，自小刻苦读书，没拿过 A-以下的成绩，通过在巴西自学的 3 个月中文，现在可以自由阅读中文读物，喜欢中国菜。小女儿 16 岁已经开始考虑大学事宜，排斥中文，并讨厌除了炒土豆丝和西红柿鸡蛋之外的所有中餐，喜欢制作个人博客以及从图书馆借阅大量英文小说。

以下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大女儿当初考取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递交的个人介绍，第二篇则是小女儿两年前回国后对中国的所思所想。

世界公民

我最讨厌别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哪里来？”而对此我只能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

20 多年前我在中国出生，当我 5 岁的时候我随妈妈远渡重洋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省，为的是能跟当时正在主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爸爸团聚。由于我初来乍到的语言障碍，班里的小孩总取笑我是聋子。再加上我是学校里屈指可数的几个亚洲孩子之一，身上的打扮和样貌难免又成为了他们数落的把柄。正当我的自尊心降到最低点和感到极度失望，并以自己的种族特征为耻辱的时候，妈妈总在一旁安慰我。她还鼓励我把学业继续下去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外人的欺辱进行还击。渐渐地，我这个只会中文、曾经苦苦挣扎、害羞和总是迟疑的女孩终于适应了周围的语言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更为可喜的是，我开始学会欣赏和感激身边的一切。在比利时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英语，法语和荷兰语。与此同时，举世闻名的比利时巧克力的香味也头一次飘到了我的鼻子边。还有那难忘的初次荡舟布鲁日运河的经历以及与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牛角包的相遇实在让人回味不尽。尽管这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可未来的几年将会是何番模样我的心里却一点儿底也没有……好不容易，我们全家终于准备开始在比利时扎根发芽了。跟中国相比，在比利时更长时间的停留也越发使我相信这里将会成为我真正的家。可这刚长出嫩芽的小树却由于爸爸工作转换的原因而又被连根拔起。我们全家此时再度迁移，跨过大西洋，抵达了南半球。于是当我 11 岁的时候，我们全家来到了巴西梦幻一般的热带海滨城市福塔雷萨。大西



洋的壮丽，带着丝丝甜味的可可汁，奇幻无比的狂欢节场景，还有巴西人独有的热情好客，它们构成了我无数挥之不去关于巴西的回忆。

出乎全家人的意料，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又一次回到了北半球。此时我们正急切地盼望着移民手续的完成和永久居民身份的颁布，而这次落户的地方位于加拿大的西海岸。多伦多使我与众不同地感受到自己浸淫在一个真正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我高级法语班的 20 个同学，来自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且有着你所能想象出的各种文化背景。我的英语口音也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地从英国腔转变成了加拿大腔，于是“Oy！”成了我不自觉就会发出的感叹词。而枫糖浆替代蜂蜜成为了薄煎饼的调味酱。滑冰也不再是奢侈的运动，转而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冬天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在所有的池塘和湖面上免费玩耍。我和妹妹还会在长途汽车旅行中用英法语大声地唱加拿大国歌。

3 年后，在美国德州普莱诺的市郊，我们第一次骄傲地拥有了能称为“自己的”房子。孤星州（得克萨斯州的别名）与我们之前所居住过的地方有着许多的不同。这里的人们特别为自己煎出的牛排质量而感到自豪，他们在特别宽敞的路上开着“加大码”的汽车，并且住在后院有游泳池的巨大房屋里。于是在此后的 5 年里，我们全家定居并开始了追求那所谓的美国梦。在那期间，随着在美国文化里的浸淫，我感觉到有必要使自己的知识变得更加丰富，同时让性格变得加倍的坚韧，并且作为个人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以适应美国这个节奏迅猛、竞争激烈和信息化驱使的社会。

15 年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一路走来，最终长成今天的我。也许，我甚至不敢想象那些环境转变时期给我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和巨大的变化。我必须说我很感激自己能拥有如此形形色色和有趣的人生经历。而其中的每个章节都充满了挑战，并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愈发开朗、明智、坚毅和充满同情心的个体。

中国日记

我的名字叫安玲史，虽然我看上去像中国人，可我并不是。我从没在中国居住过，我喝西方的牛奶和吃西方的食物，另外告诉你，在母亲的子宫，我的童年，几乎全是在美国度过的，而那不可逆转地影响了我的现在。

让我开始告诉你我对中国有着怎样的印象。

第一个巨大的、10 英寸刀子般深的来自于中国的印象就是交通。在我们被母亲童年的最好朋友从机场热情洋溢地接到之后（那里有我们的亲戚），我们在贵阳酷热无比的气温下，



（译者注：当时气温 28 度）挤在了他狭小无比的桑塔纳里。我曾经在德克萨斯州住过 5 年，我习惯了在 90 华氏度的气温下待在拥挤不堪的车里，但在德州，交通是在控制之下的。

贵阳的交通，很可惜，不是。

我们开车上路后，我的耳膜只跟一种声音碰撞了起来：汽车喇叭声。喇叭的鸣响，高音，低音，谁又知道 F 调在中国人的手上可以有那么多的变化呢？在美国，10 天内你能听到喇叭声一次或两次，并且只是在你离死还差两秒或者某人在路上确实激怒了你的情况下。

每个人开车都跟疯了一样。中国的驾驶员是世界上技巧最精湛的，或者他们根本没什么技术可言。甩尾，不打灯，随意变道。当我们试图转进另一条道，我们没成功。在美国，3 辆车之内总有一辆会让道给你。我猜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一辆车驶过，两辆，3 辆，4 辆，同时被阻挡在后面的车一直压迫着我们，我们不得不往前移动。这让我们陷入了非常恐怖的境况。

我对中国的公共教育并不太了解，尽管如此，在美国公共学校系统里接受了 9 年的教育后，我能告诉你很多关于它的事情。但我将告诉你一样特殊的事情，这部分关于毒品和酒精教育。

每个月，从我一年级到五年级的时候，两到三个从 DARE（毒品和酒精防范教育）计划来的负责人会到班级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毒品和酒精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并且我们应该一辈子远离它们。我们的老师也参与其中，他让我们做关于毒品的作业，研究为什么它们对我们有害。我猜在这种环境里成长已经把我变成了毒品和酒精的纳粹，因为我这辈子也不会触碰这些东西，更谈不上让它们污染我的身体。

被带到中国后，几乎我去的每一个地方，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晚宴的饭桌上，肯定会有人在抽烟，而且在晚餐的时候，酒精几乎到处都是。每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在抽烟，这个状况残酷地令我想起了在美国时看过的公益广告，在一个充满二手烟的房间里待上两个小时等于自己抽上一根烟。同时我十分讨厌每个人都在强迫我妈喝酒。

我觉得在中国过马路是一件艺术和巨大的挑战，因为在美国你可以蒙着眼睛过 10 次 8 次马路也没事。不幸的是在中国每个人都横冲马路，几乎没人用斑马线。我几乎无数次差点被极速移动的汽车撞到（包括单车）以至于我都数不过来次数，这真遗憾。



在美国我们是这样做的，当斑马线上的交通灯变绿，车停人走。当交通灯变红，人等车走。简单明了，对吗？对，也许这有点消耗时间，如果你冲刺到斑马线上灯变红了，可这总比被车撞死强吧。

还有一条行人必备的权利。当你在车里看到前方有人过马路，你应该立刻停车让行人经过。但是当你是行人，我还是建议你快走，这样不会刺激到司机。

一场小灾难发生在我们亲戚位于花溪的公寓里，我们最后不得不叫警察来调查。我只在美国遇到过警察（谢天谢地），那次是我的表哥玩电话的时候不小心打了 911，把警察叫了来。几分钟内，警察来到房间并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幸的是，在花溪他们用了 20 分钟才来到，之后他们是如此的不专业（按照美国的标准），开始抽烟和用手机聊天，换句话说，基本上什么都没干。

但我能理解为什么警察如此难快速出动。当我们在北京的路上，我看到一辆救护车响着警报器试图穿过车流。当救护车跟我们一样速度而行人走路超过我们的时候，我对那天需要帮助的人感到无比的惋惜。在美国，当紧急车辆例如救护车和警车通过，所有车流必须停下（或至少慢下来）。

在美国的餐馆里点菜的时候，你一般会以谢谢结束服务生的服务，然后他们会以微笑和一句“没问题”或者“你点的餐几分钟内就会准备好”作为回应。

在中国，我发现事情截然不同。我好几次被吓怕，因为点菜的人总是用粗鲁甚至侮辱的态度对待餐馆里的服务员。在美国，你尝试用最善意的方式说话，这样没人受伤。在中国，如果服务生往我们吃的菜里吐痰我不会惊讶。

同时，他们也并不快乐。在中国的头两顿饭，我很惊讶地问母亲为什么服务生看上去并不高兴，（在美国他们被训练成高兴的样子）母亲告诉我他们没有动力，因为他们没小费。

当我跟表哥和他的朋友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对我老说“谢谢”感到非常惊讶。我想这就是在美国长大带来的习惯。但是每个人都喜欢得到感谢，所以我们也许应该在每天的生活中多用“谢谢”，这样的话每个人每天都会好过一点。

总体来说，对比美国和中国这件事本身就不太靠谱。

中国有比美国长数千年的历史，美国只是一个新生儿。中国的人口远比美国多，同时中国政府的法律和法规也很不同。

文化和人民也不一样。你不能把这些变数都囊括进来然后还能看出谁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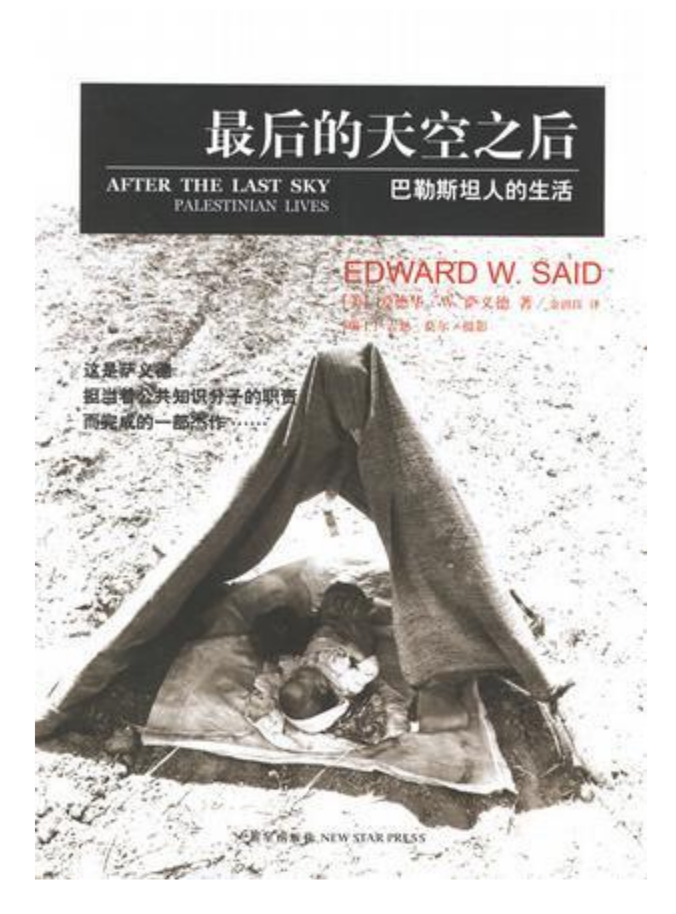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虽然价值观不同，但我们都渴求一样东西：幸福。

虽然这只是一个外人对中国的看法，但你或许会对这个话题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完全没问题。尝试从别人的观点看问题只能有益于你。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萨义德：《最后的天空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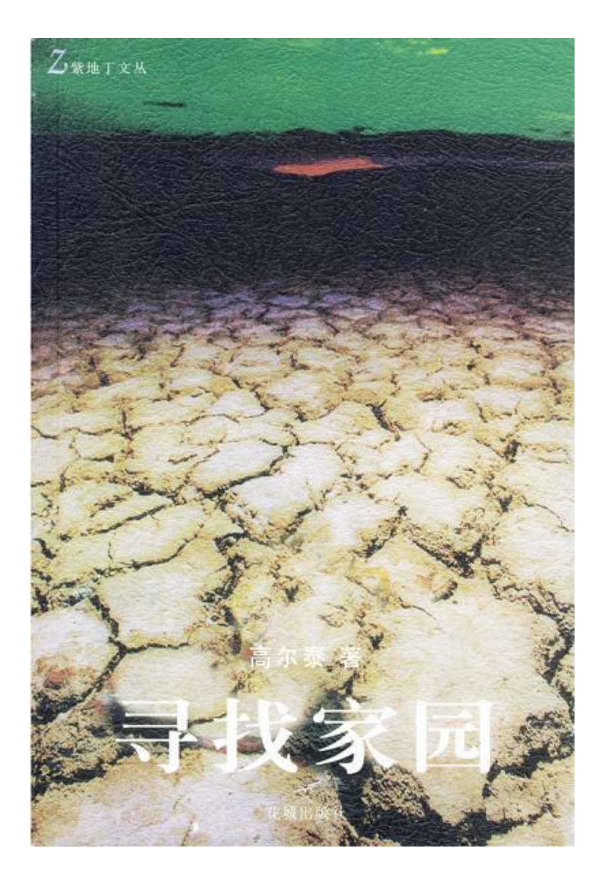


这个世界，没有一天会少了巴勒斯坦人的新闻。他们的形象似乎被固定化了：要么是凶残的恐怖分子，要么是悲惨的难民。萨义德在本书中描绘出巴勒斯坦人另一幅感人至深的真实肖像：从以色列的建立到贝鲁特的陷落，巴勒斯坦人在连续的土地剥夺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这其中也包括萨义德本人及其亲人的真实遭遇。作者指出：新的巴勒斯坦自我身份认同并不建立在流亡和受害者身份上，相反，它将在根植于坚持、希望和被唤醒的共同体感上。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高尔泰：《寻找家园》



我的故乡高淳，位于江苏省西南端与安徽省交界的地方，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省交界的寺主， 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高西低。东部是茅山山脉和天目山山脉的衔接处，山高林茂，俗称“山乡”；西部为丹阳湖、石臼湖、小南湖三湖所环绕，溪河交错，苇岸无穷，俗称“圩乡”。最早的县治固城始建于公元前五四一年，比楚威王筑石头城置金陵邑（前三三三年）还早二百来年，可称古邑。到我出生的时候，固城早已荒废，县治淳溪镇也是一个仅数千户人家的小镇。镇上只有一条三米多宽、青石板铺面的弯曲小街，俗称老街。……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特例┫

李静睿：流亡者的大篷车



自由撰稿人。

“

流亡者坐在没有退路的大篷车上，车上挂着两幅海报，一幅画上自由，一幅写着孤独，他们下不了车，却又到不了站，沿途掌声越来越稀少，歌声只能唱给自己。

”

2013 年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和朋友一家在纽约的法拉盛吃四川火锅，我几次犹豫着想告诉他，这样烫点牛肉羊肉豆腐藕片最多算是小肥羊的红油锅底，没有毛肚黄喉鹅肠鸭肠鳝鱼天梯怎么好意思说是四川火锅呢？但最后还是没有忍心，毕竟作为一个四川人，他已经整整 26 年没有回去过了，因为他是一个失去中国护照的人，一个流亡的人。

最开始十年，纽约的中餐还被咕鲁肉和左宗棠鸡霸占，连麻婆豆腐都是甜的。他吃了十年这样的麻婆豆腐，吃到味觉产生幻觉，以为麻婆豆腐理应如此，直到有一天 China Town 里开了一家正宗的四川馆子，他这才被半碗花椒惊醒：是的，这才是麻婆豆腐！

他们夫妻给女儿起名为“念”（NIAN），希望她能记住他们一家的流亡生活，这个完全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八岁时用英文写过一篇文章，她厌烦于每次被人问起名字都要重复，渴望着自己能有个正常点的名字，不管是 Amy、Kristina、还是 Michelle。八岁的时候她就明白了 exile 这个单词的含义：流亡，被流亡，放逐，被放逐。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四川老家的奶奶，而奶奶已经去世了，只有她的名字被刻在墓碑上：念。

我在美国认识许多生活被凝固于 exile 这个单词的人。有人毕业于北大，又留在北大教书，然后砰地一声，他坐牢了，判了五年。五年后他从北大青年教师摇身一变为很不成功



的书商，焦头烂额地应付各种三角债。当他感觉到自己有可能再次坐牢的时候，他离开了中国，暂时看起来永远失去了中国护照。这个 23 年前就是北大法学教师的人去年刚刚拿到了美国的法学硕士，正在奋力准备考纽约州的律师执照，然后他就可以找工作了。这已经是流亡者们最接近理想的生活：考一个学位，找一份工作，而不是辗转于这种资助与那种资助之间，直到没有任何资助，或者说任何尊严。我见过有人读了整整十年才拿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的学位，但是并没有找到工作，有一天我们一起吃饭，他喝得略微醉了，说：正好，喝醉了好去时代广场骂骂街。

流亡的人大都在国内算得上是 somebody，不是每个人都能坦然接受从此变成 nobody 的命运，甚至连他们的孩子都不能接受，好几个考到哥大或者哈佛的孩子在亲眼看到自己父辈的落魄之后几乎疯了，以镇静剂勉强活了下来。

有人跟我说，当流亡生涯进入第七年，终于确认自己真的回不去，而周边的一切又跟自己毫无关系之后，她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所有宏大叙事的信念都不能帮助自己。也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但他提及的是坐牢，坐牢七年的时候他崩溃了，抑郁失眠一切随之而来，出狱三年至今依然要服用大剂量的抗抑郁药。懂星相学的人说，代表变化的天王星刚好七年走过一个宫，这意味着这一年会成为某种临界点，不管是婚姻、流亡还是牢狱，而后面两个，也许多少有些共通。

这一切就像哈金在《自由生活》里借一个牧师的口说流亡者的状态：“得到天空的自由，却失去大地的引力。”犹太人、苏联人、东欧人写过无数关于流亡的动人作品，但写中国人的，也许这是最让人痛苦的一本。书里的武男在中国护照被注销之后，辗转生活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小镇，曾经想使自己完全脱离这里的中国社区，过一种隐居的、不被人打扰的日子，但是他也感慨“中国永远不会放开他们的。不论走到了哪里，那块故土都跟着他们”。书里的刘先生，在发现自己得了肺癌后想方设法回了中国，因为他要死在祖国，但是他死前却留下遗嘱，让人把一半的骨灰带到北美，因为他希望自己的灵魂（起码是部分的灵魂）挣脱樊笼，获得自由。哈金自己也算是半个流亡者，2004 年他曾经申请回北京大学英文系教美国诗歌，但是北大没有回复他。

吉皮乌斯 1922 年曾在巴黎悲叹：“整个俄国文学都流亡到国外去了。”甚至左派如高尔基，也因撰文反对十月革命在意大利生活了十年。这样的命运正在慢慢加诸于中国，甚至加诸于我自己，在美国生活了这一段时间之后，这已经是我最大的噩梦与恐惧。对流亡可能有千万种态度，但没有一种能逃避其中的残酷。托马斯·曼也许是最强悍的一种流亡，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中写过，当托马斯?曼不得不过着流亡者生涯时，他也



总是带着显而易见的鄙视之情使用“流亡”一词。他讨厌“流亡”一词所包含的怨恨氛围，坚持认为自己处于流亡者的圈子之外，“他觉得自己不是避难者，只是一个迫不得已离开国外、到国外居住一段时间的德国公民”。

流亡者坐在没有退路的大篷车上，车上挂着两幅海报，一幅画上自由，一幅写着孤独，他们下不了车，却又到不了站，沿途掌声越来越稀少，所有的歌声都只能唱给自己。唯一可以支撑他们的大概是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的那句诗，在祖国尚被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控制的年代，她流亡西德，然后在《我怕故我写》中写下：“这里不是我的家/哪里有齐奥塞斯库/哪里就是异乡”。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齐奥塞斯库被处死了。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徐伟明：从巫山到三水 移民十年


经济观察报记者。

"

移民之所以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很重要的因素是自身心态有问题，“没有真正面对现实。移民要和当地人真正平等，是不可能的。”“别指望太多的政府扶持。”邹厚斌认为，移民必须通过这一代人的努力，让后代跳出移民村，“我们要给下一代建立社会平台，让他们有一个社会网。

"

8 月 15 日，佛山三水新岗村。村民把积累了好几年的村财 1 万多元全部用完。本村大厨光膀子上阵，做出 20 圆桌的肉、鱼、虾、鸡、甚至还有一道甲鱼汤。

他们在纪念移民的十年。2001 年 8 月 15 日，为了配合三峡大坝的建设，他们——一共 1202 人，从重庆巫山迁居佛山三水，在这里的 10 个移民点安顿下来。

一晃十年。

移民们的重辣口味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他们已经不习惯在菜里放太多辣椒，有些小孩甚至不敢吃辣。所以，在当天的宴席上，有重庆的麻辣口味，也有清淡的粤式炒菜。

但要融入当地生活，不像改变口味那么简单。三水区移民办主任陈汉忠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三峡移民只是“基本融入”了当地社会，距离真正的融入还相差太远。

杨孝军是三水 1202 名移民中的一员，也是新岗村村主任。过去几年，他带领村里移民持续与政府博弈。纪念宴席上，他拿着啤酒逐桌敬酒，动情地说：“以后的日子一定要幸福。”但如何才能幸福，以及怎样让村民尽早撕去移民标签，他心里没底。



融入是个漫长过程，过去的十年才刚开始，杨孝军以及所有移民，还要再经过数个漫长的十年才能真正成为当地人。

两头无根的生活

杨孝军高高瘦瘦、精力充沛。十年前，他 26 岁，大专毕业后在重庆巫山县一家国营火电厂工作。

当初杨孝军可以不迁移这么远，而选择就地投靠。决定远移的原因很简单——希望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而广东应该有更多的创富机会。最后他说服了妻子。

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当初太冲动，妻子也后悔听信他的鼓动。一些移民在头两年反悔，伴随而来的是回迁的高潮。

记者调查发现，2004 年之前，新岗村共回迁了 8 户。其中有 3 户是离异家庭，回迁是为再婚；其余几户是在当地找不到发展机会，回重庆投靠亲戚。

据陈汉忠介绍，截至 2011 年，三水共回流移民 100 多人，主要是头两年回去的老人和孩子。老人没法适应广东的生活，有些家庭在这边支付不了孩子的教育费。

杨孝军和多数人一样，想回迁，但回不去。

杨孝军在移民后只回过一趟巫山。在老家，房子已经被淹没，亲友们也大多移民别处，原来在那儿的社会关系都已被“连根拔起”。

在三水他是无根的，回巫山也同样无根。但在移民村，他好歹还有人均 20 平方米的安置房。

移民们在三水的生活遇到许多困难，最难过的是语言关。在惠州市博罗县蓝田镇，有一个移民买了一头牛，那牛听惯广东话，不理解新主人的重庆话，不能按新主人的指令干活。

杨孝军的义妹郭丹说，头些年，她去镇里的市场买菜，肉菜贩子用粤语报价，她假装能听懂，以免被骗。她每次都刻意不说话，不管贩子说多少钱，一律递上 10 元，等找钱。

她以为这样就能假装本地人。但当地人告诉记者，移民非常好辨认，他们买菜买肉总是买很多，拿回家储存着慢慢吃，但本地人每次只买一点，吃完下次再买。



时间久了，一些口齿伶俐的移民很快就学会简单的粤语。但像杨孝军这些年纪大一些的移民，对新语言不敏感，开口说粤语自己都觉得难为情。在镇上，他只要一开口，就能被人认出是移民。

直到今天，由于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的相互隔阂，致使双方交往稀少。

隔壁村的当地人张伟泉说，他只认识一个移民，交往也不多。而当地一名“摩的”司机说，他不想和这些移民交往，觉得他们很蛮，国家给这些移民发了这么多钱，他们还处处不满。

杨孝军也觉得，少数人把移民的形象搞砸了。一些移民稍有不满，就集体找政府闹事，给人留下移民蛮不讲理的印象。有些移民过惯了巫山的懒散生活，进厂打工后还总是迟到早退，后来，一些工厂一听说是移民就不要。

目前三水移民的年平均收入是 6500－7000 元，包括三峡工程每人 600 元 / 年补贴。移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进厂打工、出租房屋。

大约 2004 年时，杨孝军就在安置房上加盖了一层，自家搬到二楼住，一楼的 3 间房子租出去，每月能多收租金 600 元。这类租金收入在移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不小，一些移民甚至把原来的安置房加盖到 3 层。

但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周边的工厂倒闭不少，一些移民随之失业。工人减少之后，房屋租户也少了，移民的租金收入也相应下降。

新岗村一天的生活也足够简单。早晨，男人们早起，开摩托车去工厂，傍晚才回家吃饭睡觉。女人主要留在家里看孩子，顺便做点计件工，大部分时候村里无比寂静。

村里的老头称移民村是“特别行政区”，除了进厂打工外，移民几乎只在村内活动，说重庆方言，吃重庆菜，和外界沟通不多，通婚更罕见。

到目前为止，移民大多是在重庆老乡里找对象。只有一个例外，移民廖开清娶了一个当地离异女子，他的新婚妻子告诉记者，愿意嫁给移民有两个原因：重庆男人较会疼女人，对妻子是否离异过也没那么在乎。

敏感的群体

杨孝军一来就被选为村主任，因为他大专学历是同代移民中最高的。一上任，他就感受到了来自移民和政府的双重压力。



移民们如果有不满，需要村主任去代表和政府谈判交涉。他们最关心的是土地。按移民政策，每个移民可分 0.6 亩耕地。一些移民村幸运地分到较好的地块，但新岗村没这么幸运，其所得是土地 105 亩，位于北江排涝区，底下是砂石，土层太浅。

杨孝军说，村里没有集体土地，村民分到的土地中，32 亩鱼塘承包出去每年租金收入是 2.4 万元；73 亩出租给人养牛蛙，年收入 2.6 万元；另一块地租给别人做汽修厂，三部分加起来全年集体收入 6 万元。扣除村里的提留后再均摊给村民，每人一年分不到 100 元。

在乐平镇的移民村新鹤村，村民许国权告诉记者，移民分得的土地在高压线正下方，很难出租出去。

移民希望能置换土地，但镇政府认为，当初有两块土地让移民选择，最终选了现在这块，并签了协议，无法再做变更。

移民希望村主任强硬，“把事情闹大”。杨孝军频繁和政府交涉，但最终两边都不好做人。

“我只是当移民和政府之间的传声筒，将两方的说法上传下达。但矛盾很尖锐，移民将我作为村主任的权力过分扩大化了，他们认为我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当了村主任 3 个月后，杨孝军主动辞职。

后来的两任村主任最终也没法带领移民解决土地等焦点问题。2008 年年中，新岗村村民又一次将杨孝军选为村主任。

当了这么多年村主任，杨孝军感觉到，移民与外界接触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外界总认为他们是敏感群体。

2008 年 8 月，移民汪立武被查出得了食道癌，汪所在工厂以这不是职业病为由，不愿替他支付医药费。汪一个人去交涉无果，杨孝军和其他 10 来个移民一起去交涉，厂方以为是来闹事的马上报了警。该工厂从此以后再不招移民了。

事实上，将移民以 100 多人/村的规模来安置，便是出于“维稳”考虑。此前，移民曾先是独家独户安插在本地人之中，例如杨孝军的表哥，就是单独一户被安置在肇庆高要。结果，移民很容易被欺负，导致回迁率很高。后来，政府又把上千移民安置在一个村里，例如肇庆市大旺移民村，结果移民很容易“闹起来”。现在这种折中的、小规模聚居的模式，既减少了回迁率，又便于政府管理。

十年之后，政府依然视移民为“敏感问题”。记者获悉，由于各地移民都将陆续迎来十周年，因此上级部门向各级政府及移民办下发通知，要求注意移民动态。

目前广东省各区的移民部门负责人会定期开会，除了反映移民现状、商讨对策外，还有一个重大议题是互通移民活动的信息，以防各地移民之间“串联”起来。

针对此次三水移民十周年，当地政府人士向记者表示，政府对聚餐的态度是“不主张，不反对”。但在乐平镇，一名移民村村主任告诉记者，该镇 4 个移民村向镇民政部门申请组织聚餐，均遭到反对。

在其他村得以举行的聚餐上，当地镇司法所、派出所都派人参加。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其实他们是在监督，以防移民喝多了“出事”，又酿成“敏感事件”。

梦想在下一代

准备在移民后大干一番的杨孝军，最后还是只能在工厂打工，领取不超过 3000 元的月薪。

他曾经多次想要自己创业，但诸多创意设想都因缺少资金而夭折。

同村的张科权也苦于借贷无门。他坐在自己的杂货店前，叼着香烟等生意，牙齿被熏得黄黑。杂货店楼上，他经营了一个小网吧。

张科权告诉记者，他 2005 年左右想筹资养羊，但无论如何争取，都弄不到贷款。

事实上，移民村房屋的产权不完整，不能用来抵押贷款，没有一家银行敢在移民违约后没收移民的房子。政府更担心，移民如果把房子都赔了，也会带来敏感的社会问题。

三水移民办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多次向广东省移民办上交报告反映，并提出解决方案。但报告递交上去，从未有过回音。

乐平源潭村的移民邹厚斌算是个成功创业的例外，他先是在东莞与人合伙打拼，拥有资本之后回移民村创业，投建了一个花边厂。如今他的花边厂资产数百万，雇用了很多移民老乡。源潭村成为三水移民村中最富裕的。

但邹厚斌却告诉记者，这一代移民的使命是“牺牲”，为下一代人的发展做铺垫。

事实上，不少移民和邹厚斌的观点类似，对本代人融入当地社会并不抱很大的希望。

邹厚斌告诉记者，移民之所以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很重要的因素是自身心态有问题，“没有真正面对现实。移民要和当地人真正平等，是不可能的。”“别指望太多的政府扶



持。”邹厚斌认为，移民必须通过这一代人的努力，让后代跳出移民村，“我们要给下一代建立社会平台，让他们有一个社会网。”

其中，最关键的是教育。邹厚斌把儿子送到东莞一所贵族学校就读。他毫不掩饰自己这样做的现实考量——为儿子创造好的交际环境，儿子现在的同学，将来都会变成宝贵的关系网络。

据介绍，目前三水移民中，共有 50 多人是大学生，其中 30 多人毕业后跳出移民村到了别的城市工作。在邹看来，这意味着摆脱了移民村，改变了命运。

杨孝军也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他把孩子送到三水最好的初中，一年学费就要 1.5 万元，另外还要支付一学期 3880 元服装费、住宿费；每月 300 元到 450 元的伙食费。再减去各种家庭开支，家庭收入一年剩不到 1 万。但这些花费在下一代的教育投资，杨孝军认为值得。“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和本地人说着同样的话，有同样的习惯，人们不再觉得他是移民，大家都是三水人，这才是真的融合了。”一名移民说。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刘岩川，宗洁

设计：潘雯怡，池春荣，季文仪

校订：施钰涵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版权声明：一五一十电子周刊所选文章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所有使用都请与原作者联系。

